

筆談與漂流記的現場編輯以及直至出版為止的距離

許敬震

延世大學校 國語國文學科

hur@yonsei.ac.kr

當韓國和日本知識分子在前現代相遇時幾乎都留下了一個記錄。這些記錄採用了遊記、筆談和中國詩歌的形式。遊記是回國後單方面所作的記錄，而中國詩歌和筆談的記錄皆在雙方都在同一地點時進行，其後由日方負責編輯出版。由於編輯筆談和詩歌的草稿直到出版之前皆需要時間，導致韓國的知識分子常常在無法確認出版本的情況下回國。因此，筆談和中國詩歌詠唱的生動的現場記錄有可能根據日本編輯的意圖而被撰改。

當李志恆漂流到北海道時，他與日本官員會面的筆談在他歸國並向東莞官員陳述的證詞中被部份改變，這也有可能是由粗心大意所致。新井白石的《坐間筆語》在經過八十年重新修訂然後出版，卻被利用於貶低當時韓國使節團（通信使）所發揮的作用。《雞壇嚶鳴》包含了 1763 年珍貴的現場筆談唱酬記錄，卻在通信使返回朝鮮之前在載有激進的序言的情況下被出版了。

雖然我們無法輕易斷定實際在現場進行的筆談與出版的版本之間的差異到底是謊言還是失真。但是，我們有必要去研究筆談與編輯和出版之間的那個距離。此外，在研究與日韓關係相關的材料時，也應仔細探討這些材料的真實性。